



CHUBANKEXUETANSUO



出版科学探索

出版科学探索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湖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科学探索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
湖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责任编辑：胡海清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375 插页：4 字数：218,000

印数：(精)1—1,200 (平)1—2,300

(精装) ISBN 7—5357—0353—4

G·14 定价：4.30 元

(平装) ISBN 7—5357—0356—9

G·15 定价：3.00 元

地科 88—3

《出版科学探索》和读者见面了。这是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和湖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编的一本学术论文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兴旺景象。

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科学的理论研究活动正在兴起。近几年来，湖南省出版界的理论研究工作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86年，湖南省首届出版学术讨论会收到了70多篇论文。会后，又有一批新的论文产生。这些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总结我省出版工作实践经验，探索出版工作客观规律。

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是从湖南省首届学术讨论会以来撰写的100多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其中有的已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有的还在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交流，得到了较好的评价。这些文章有对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探讨；有对出版物结构、效益、竞争的研究；有对出版工作特点、规律、经验以及各方面协调工作的论述；有对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的讨论。这些问题的论述有新意，有见地，对新闻出版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了促进出版科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进一步加强出版队伍的建设，提高人员的素质；为了把研究的成果用来推进工作，促进出版事业的改革、开放、搞活，很有必要出版理论研究方面

的图书。《出版科学探索》就是为此目的而出版的。

本书所收文章是由周笃佑、刘刚生、唐俊荣、王劲松、常绳生、郑清源、胡海清等同志选编的。虽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比较、评选，但由于出版这样的文集，我们还是首次尝试，缺乏经验，因此，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疏漏甚至错误，衷心地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对给予编辑本论文集热情关心、支持的所有同志，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年11月24日

目 录

谈开展出版学科的学术理论研究(代序言)	李冰封(1)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发行体制初探	胡 真(8)
试论出版物的社会效益	李冰封(25)
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与议	车 平 常绳生(30)
论书态平衡	汪 华 陈一心(38)
图书出版空间的拓展	李一安(48)
图书的深层结构分析	张自文(57)
书刊编辑的知识结构	张先友(70)
编辑人才及其培养	刘升铨(77)
科技编辑人员的培养	闻 烽 王金荣(84)
编辑道德初探	王劲松(87)
科技编辑工作要刻意求新	胡海清(96)
选题的科学决策	蒋敦雄 曾印江(103)
书稿全面质量管理概论	胡本昱(111)
出版社“三审制”的改革	欧阳维诚 刘清华(120)
医学的“前沿”与医学选题的更新	张碧金(129)
正确选择处女作的思维层次	李屏南(136)
图书重印在出版工作新形势下的地位	李全安(142)
论学报工作的几个关系	唐子畏(151)
徐特立编辑教育刊物思想浅识	唐仲扬(157)

编辑与图书发行	贺晓兴(166)
图书广告语言探微	欧阳再生(178)
图书流转良性循环初探	卹协会(186)
我国出版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王纪卿(195)
按经济规律做好图书出版发行工作	王国光(201)
坚持改革,搞活农村图书市场	
——“五定一奖”责任制初探	杨 锋 唐拓平(209)
试论店社联营	戴承统(218)
关于图书出版脱期的思考	朱建纲(229)
努力缩短湘版图书发运周期	文惠安(236)
图书零售价格管理形式初探	许尚律(244)
出版用纸的合理库存与控制	胡可安(250)

谈开展出版学科的学术理论研究(代序言)

李冰封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举办湖南省版协的首届出版论文讨论会，这件事很值得祝贺。我们湖南出版系统，对于出版学术方面的研究，早几年做得很不够，现在开始注意了。能够开这样的会，能够一次拿出60来篇论文，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这项工作已经起步了。不管怎样，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始。西方有句谚语：“好的开始便是成功的一半。”有了这个开始，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引导大家研究些重要问题，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从而提高论文质量，那么，我们的出版学术研究，是可以逐步开展起来，并能做出成绩来的。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好的开始。

在这里，我讲三点意见，供同志们作参考。

第一点意见，讲一讲为什么我们需要开展出版方面的学术理论研究。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年中，由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省委的关怀和支持，也由于我们全系统各个环节、各个部门上上下下同志们的努力，湖南的出版工作做出了成绩，事业发展了，出了许多好书，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我们应该作些什么新的努力来进一步做好我们的工作呢？我想，就是要总结经验，要把八年来大家努力做出的成绩、取得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加以概括，使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这些经验能

* 1986年9月15日，湖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在湖南大庸市召开首届出版论文讨论会。这是作者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够成为全系统的共同财富。此外，我们还要学习、研究各个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同行以及国外同行于我们有用的经验。从自己和别人的经验中找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运用这些规律，使我们大家在工作中，自觉地让这些规律发挥作用。这样，我们的一些工作，就不会是即兴式的，而是有一种理论在指导。有理论指导的思维，就能处在一种主动状态之中。这样，工作就必定会进一步做出成绩。所以，在目前，如果我们不把理论研究抓好，工作就很不容易深入一步，提高一步。

从工作上说，无论从宏观方面或从微观方面看，都需要作这种理论研究。

在宏观方面，我们要在本世纪末把湖南逐步建成为我国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就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物质条件，人才条件，思想文化条件，市场条件。这几个条件的形成，都需要理论作指导，特别是后三个条件。

物质条件。这几年，我们在这一方面作了些努力。比如，省新华印刷三厂的扩建，引进激光照排等先进设备，要增强排字能力和装订能力；省新华书店赤岗冲仓库的建设（这是目前全国省级新华书店中最大的一个仓库），意在增强发运能力；长沙市新华书店袁家岭营业大楼的建成，意在增加上市的图书品种、增强销售能力。这个门市部的营业面积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这几年，抓紧建设职工住房，大院里的几个出版社共建房两万多平方米，使职工们能住得好些，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这些都算是物质条件。创立物质条件，当然也有战略思想在指导，也有理论问题，但牵涉到实际问题多些。这方面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人才条件。八年来，我们能把湖南的出版工作搞上来，发挥各种类型人才的作用，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当我们着眼于今后的任务的时候，那就不能不看到现在许多业务骨干都是50多岁、60岁上下了。这批同志，我们当然要继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为了事业的继续发展，更重要的，要在中青年

人中发现人才，加以培养提高，使之迅速成长为新的业务骨干。这些人才应该包括：编辑人才，出版管理和印刷、发行、科研、教学、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人才的发现、培养、教育和正确使用，都有许多理论问题要研究。人才学是研究一般性的问题，我们要研究的是出版人才的理论，是一般中的特殊。

思想文化条件。这是形成出版基地的很重要的条件，也可以说是核心。因为一个出版基地，总是和思想文化的汇合点联系在一起，总是在传播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就象五四前后的北京，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现在，对马列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新的科学文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要正确传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和改革、开放紧密结合起来。这就需要研究当代的思潮，研究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文化，研究科学发展的动向。当然，更要联系实际研究马列主义的发展。这就需要方法，需要理论。这些理论是和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比较文化、文化史、思想史、文学理论、文学史、艺术史等等，等等，紧密相联的。这些多学科的研究信息，必须要在这个出版基地，在这个思想文化汇合点上汇合。使这个基地上的出版物，要体现出思想、文化、科学、艺术的最新动向和成就。这就是说，一个出版基地必须同时是思想文化的汇合点，要往这方面努力。这就需要理论作指导，不可能出现没有理论色彩的思想文化的汇合点。

市场条件。图书这种商品有很大的特殊性，但毕竟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切规律都不可能不在我们的图书经营中发挥作用，是商品就要有市场。怎么扩大市场，扩大销售；怎么把市场搞活，满足读者需要；怎么通过市场的扩大来发展我们的出版事业，这就需要加以研究。我们是十分重视图书的社会效益的，但是这种社会效益只能通过市场的销售来实现。你说这是一本很好、很重要的著作，可以产生很明显的社会效益，但书店却只要三五百本；有些地方读者需要，却又买不到，你这社会效益又如何能发挥出来呢？所以，在图书经营中如何既体现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的规律，又不把它等同于单纯考虑各项经济指标的一般商业，这里面就有一种理论，一种学问，需要深入探讨。这种理论和学问，暂且就叫做图书市场学吧。没有理论作指导，我们的发行工作，到底是带有某些盲目性的实践。盲目的实践肯定成不了大事，因为你不了解规律。所以，从宏观上看，要形成出版基地所需要的这四个条件，都需要一种理论来引导。理论不可能靠哪一个人来制定，需要大家同心协力，群策群力，结合实际加以研究、阐述。

从微观方面看，也是如此，也需要理论。搞好一种门类乃至一本书的编辑，一个出版社、一个印刷厂或一个基层书店的管理，乃至纸张供应、印刷物资供应等等，都需要作些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带点理论色彩的研究。这一次论文题目中，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以后，也还需要对这方面，即微观方面，作继续深入的研究。

应该这样说，无论从宏观方面或从微观方面，我们有计划的研究都做得很不够。所以，我们一定要逐步改变这个状态，使理论研究能够走在我们工作的前面，至少和工作并驾齐驱，而不是落在它的后面。

第二点意见，我们要创造一个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鼓励理论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实是很正确的口号，确实是繁荣科学文化的重要方针。这口号提出30年了，但在30年中认真地贯彻这口号的时间不多。口号提出不久，就是1957年，双百方针变成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工具。以后，又说百家只有两家，要“兴无灭资”，使这方针变成了一种消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方法。我认为，把学术问题归结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非此即彼，也就太简单化了，有形而上学之嫌。再以后，连“两家”都不提了，干脆取消了这口号。文化大革命中，就没提这口号了嘛。

现在我们要认真贯彻这口号。看来，要真正地繁荣学术、繁荣科学文化，也只有认真贯彻这口号，执行党的这个正确方针。

搞大轰大擂的“学术批判”，实际上是在阻碍学术的发展。

早一向，《人民日报》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都登了一篇报道，讲到建国以来，对自然科学领域中进行的三十多次学术批判，几乎都批判错了。这里面有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也就是基因学说。人家已经能够用分子结构来说明DNA。生物工程的理论和技术就是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我们自己不懂，不研究，还去批判人家！5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学习时，有一位教辩证唯物主义的外国哲学教授，开口闭口就骂人家是“伪科学”，好象只有李森科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科学。历史是最公正最无情的，结果怎样，大家都看到了。被批判为“伪科学”的还有控制论，也就是所谓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之一的重要理论。1947年维纳《控制论》一书的发表，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作用不可估量，我们在50年代还抓紧批判哩。被批判的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制造机器人作为理论依据的人工智能学说，还有化学上的共振论、生物学上的分子生物学、地质学上的板块结构学说，等等。自己不知道的，也不想去学习，去知道，就胡乱地批判人家，结果形成了武断，造成了蒙昧，使我们许多科学停滞不前。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比如，对《武训传》的批判和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结果都不好。反胡风也反错了，抓了人家，关了人家，这且不说，在文艺思想上也有搞错了的。比如，批判“写真实”，就错了。为什么出现了许多粉饰现实、掩盖矛盾、助长了假大空倾向的作品？恐怕就是因为批判了“写真实”。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搞错了，叫做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没有这三亿，恐怕我们现在的日子就好过一些。这些都是批错了或基本批错了的。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所谓“大批判”，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更不必说了。

我们应该吸取这个历史教训。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近二三十年我们的科学文化就总的倾向说其所以停滞不前的原因所在。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要创造一个和谐团结的政治环境，

来贯彻这一方针。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在贯彻“双百”方针中，对学术问题，既应提倡批评，还应该允许反批评。双方平等地讨论，求出一个真理。批评文章一出现，就认为是打棍子，这情况也是不正常的。结果还是只让自己说话，不许别人说话。你对批评文章有意见，可以提出反批评嘛。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真理一定会愈辩愈明。自己又提不出反批评，就只好说别人打棍子什么的，这都不是研究学术的态度。

我们一定要造成一个互相信任的、生动活泼的、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来进行一些有益的学术研究。

第三点意见，要造成一种风气，鼓励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实际。

有些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比如，古代出版史的研究，版本学的研究，等等，当然也要搞，但更重要的，要把重点、中心，放在研究当前的实际问题上，解决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第十一条中讲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过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实际上讲了研究理论的方向问题：改变世界。要改变世界，就要不但能说明、解释实际问题，而且要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七大提出了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逐渐被一些人淡忘了，现在要强调一下。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钻研实际，研究实际。

如果空对空地写些论文，或者是参照一下别人的论点，“敷衍成文”，道理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就是不能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也就不能说明世界，更不用说改变世界了。那么，这种理论文章就是空头的理论文章。这种理论家就是空头的理论家。当这种空头理论家并不难，但有什么意思呢？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下子就要消声匿迹的。因为你的理论研究不起作用。一定要研究些实际问题，解决些实际问题，这样的理论研究才真正在历史长河中起那么一点点作用。我们讲，要有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其中一个方面，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当然，联系实际并不是就事论事。有一种文章，虽然也引证了实际生活中的事例，但就事论事，没有理论的概括，没有哲学的抽象，因此也就没有理论色彩。不是说引用了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就叫有理论色彩。所谓理论色彩，是指要在理论的高度上进行概括、总结，要说出事物的本质，要说得深刻。

没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就不叫学术论文，也就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论文。我们讲提高论文质量，是讲文章要既能联系实际，说明实际问题，指出改变实际的道路、方向；又要看它的深刻性如何，看它能不能接触本质，说明本质，能不能说得深透。我们要提倡能接触本质，有理论深度，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

如果我们大家从宏观到微观，都能用心地研究些实际问题，都能注意有计划地发挥每个研究者的兴趣、特长，鼓励他们进行有效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的版协，以及出版局的研究部门和咨询部门——情报资料室和审编委员会，都能加以鉴定，分别情况加以应用，那么，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比今天做得更好一些；我们一定能在本世纪末，把湖南建成一个全国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而且一定也能够这样做。

我讲的就是这些，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出版发行体制初探

胡真

现在大家都在思索、议论关于社会主义出版发行领导体制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实践向人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问题。

中国出版发行事业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有权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发行领导体制。但是，这种领导体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建国36年来，大家一直都在探索、实践、再探索、再实践，然而至今还没有摸索到一条完善的、正确的路子。“走自己的道路”，还需要继续探索。

一 建国后出版发行领导体制几次 大变动的经验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置了国家出版总署，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管全国出版发行事业的独立工作部门。出版界卓有盛誉的前辈胡愈之担任总署署长。

国家出版总署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为发展国家出版发行

事业做了许多出色的、开创性的工作，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出版发行事业的行政管理机构新闻出版处，逐步建立了地方综合性人民出版社、书刊印刷厂、新华书店等单位，形成了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基本上能适应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发展需要的出版发行领导体制的雏形。由此可见，新中国的出版发行事业同共和国的诞生血肉相连，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的战略思想。

但是，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出版发行领导体制雏形，还没有得到完善和发展，就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发行领导体制的第一次大变动。1954年10月，国家出版总署撤销了，在中央文化部增设了一个职能局——出版事业管理局。接着，地方上的新闻出版处也撤销，综合性人民出版社、书刊印刷厂、新华书店等单位，由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事业管理局领导。当时，文化部门的业务范围很宽，战线也很长，实际上无暇顾及出版发行事业。实行由文化部门领导出版发行工作的领导体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严重影响了我国出版发行事业更好的发展。

出版发行领导体制第二次大的变动，是1973年9月，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出版发行事业遭到了无以复加的野蛮摧残。在这危难之际，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务院，讨论并批准成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挽救了国家的出版发行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决策。粉碎“四人帮”后，各省、市、自治区很快地相继成立了出版局。这次大变动，不是国家出版总署时期的出版发行领导体制的历史重复，而是一个新的发展，它比国家出版总署时期完善了，不仅在中央，而且在地方，都有了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有权威的出版发行工作主管部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1979年12月8日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制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这对地方出版社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促进了出版发行事业大发展。中央和地方各类专业出版社也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在省、市、自治区出版局领导下，地方出版发行

工作形成了编、印、发、供一条龙，各个环节紧紧相扣，图书品种急剧增长，冷门图书相继出版，图书质量普遍提高，图书开本多样化，印刷质量逐步精美，出版周期日益缩短。总之，这个时期整个出版发行战线出现了空前活跃的生动活泼局面。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史上最好的、最有生气的一个时期。

1982年夏季，全国开始机构改革，精简机构。五月，根据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的决定，原文化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外文出版发行局、对外文委五个单位合并，组成新的文化部。1983年，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的做法，把地方出版局也基本上“一刀切”切掉了。从中央到地方，出版发行工作又划归文化部门领导。这样，全国的出版发行领导体制恢复了1954年10月至1973年9月这段时间的局面。所不同的是，这时规定了“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的干部配备、政治待遇，应与当地同级报社相同”，换一句话说，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都应该升级成为厅局一级单位。这就是建国后出版发行领导体制的第三次大变动。机构改革应该使已建立起来的统一的、独立的、有权威的、而且正在日趋完善的出版发行领导体制进一步完善，但是，这次大变动的结果，把原来受到各方面好评的、统一的、独立的、有权威的出版发行领导体制搞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不统一的、多头领导的、混乱的、缺乏权威的出版发行领导体制。这对原来统一的、独立的、有权威的出版领导体制来说，是一个退步。在出版管理需要加强的条件下，它比1954年那次变动，更不利于党和政府加强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和管理。

综合以上所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发行史上，出版发行领导体制经历了出版总署、文化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机构改革后的新文化部主管全国出版发行工作的四个历史时期，三次大的变动。其中，出版总署只存在5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存在的时间稍长一点，也只有9年。而文化部第一次主管全国出版发行工作的时间就长达19年之久，由机构改革后的新文化部主